

# 优化选题是出版工作的关键

赵 继 准

在出版工作的诸多环节中,最主要的有编辑、出版、发行三大环节。如果就其是否牵动全局和影响深远而论,选题计划的制订与优化,无疑是影响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关系到出版社兴衰成败的关键环节。

武汉大学出版社一直比较重视选题计划的制订与优化工作,有一些体会,积累了一些经验,主要的可概括为以下四个方面:

## 一、选优去劣,坚定不移地贯彻党的出版方针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出版工作的决定》指出:“我国的出版事业,与资本主义的出版事业根本不同,是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的一个组成部分,必须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根本方针,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传播一切有益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科学技术和文化知识,丰富人民的精神文化生活。如果对社会主义的性质认识模糊,就不能很好地贯彻我们的出版方针,不能保证坚持出版工作的社会主义方向。”

大学出版社作为我国出版事业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几年来不同程度地受到社会上错误思潮的影响。某些单纯以赢利为目的的出版、发行单位或个人,将一些内容淫秽、格调低下或政治倾向不好的书刊投入市场;某些出版社经不起金钱的诱惑,忘掉了自己的社会责任和历史使命,为某些坏书的出版开发了许可证。致使图书出版物这种特殊商品成为某些人追求利润甚至赚昧心钱的中介物。在这股错误思潮面前,武大出版社作出了正确选择。以1989年为例,有30余种这类政治倾向不好或格调不高的书稿先后送到我社要求出版,有的作者一方面以可观的经济收入为条件进行拉拢诱惑;另一方面又以“不要保守”来施加精神压力。在软硬两手的进攻面前,我们并未陷入困惑之中,而是牢记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出版方针,始终把出书的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当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二者不可得兼时,宁可舍弃经济效益。在工作中不仅抵制了那些倾向明显不好的书的出版,就是对那些处于“两可”或“擦边球”式的书也严格把关。如《通向权力之路》,虽提供了一些人们可以引以为戒的内容,但书中杂有某些政治倾向不健康的东西。经过认真审稿和反复讨论后,一致认为这种书赚钱再多也不能出。《犯罪心理学》从题目上看无什么问题,其体系和有些内容也是可取的,但作者过多地渲染强奸、乱伦等犯罪时的心态和细节,起到了传播流毒的作用。作者又不同意修改,出版社坚决不出。后来书刊清理整顿的事实证明,对那30余种书稿抵制得非常正确,否则,哪怕是出了其中的一本两本,出版社就要陷入十分被动的境地。在坚持正确的出书方向抵制坏书的同时,我社将有限的财力用于出版学术著作和教材,仅1989年一年,就出版教材和专著90余种,亏损40余万元,《中国民主党派史》、《训诂学初稿》等,每种亏损都在万元以上。由于在选题的把关上,我们如按照党的出版方针,坚持了正确的选择标准,所以在清理整

顿中经受住了检验，受到上级有关部门的肯定和好评。

大学出版社有其自身的特点，有区别于其他出版社的出书范围和对象。按照国家新闻出版部门有关文件的规定，大学出版社不得出版文艺创作、翻译小说、实用性图书及中、小学学习辅导材料等。这个规定是正确还是不正确，各家说法不一。有的认为这是地方出版社向大学出版社争地盘，砍断了大学出版社的财路。我社绝大多数同志认为作这个规定是必要的。各类出版社分工出书的范围不同，有这个规定比没有这个规定好。我们应集中精力出大学教材和学术著作，真正办出大学出版社的特色。

有人把编辑出版称为“信息聚集物的选择者”，这话不错。出版者选择书稿实际上起着舆论导向的作用，既对读者产生影响，又对作者产生作用，并以其整体的选择行为，引导社会文化的流向。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不仅校内作者，连许多校外作者也理解了我社的出版构想，愿意配合我们把优化选题的工作搞好。

## 二、突出“特色”，坚持为教学科研服务

大学出版社的主要任务是：出版教材、教学参考书和学术著作，促进高等学校教学、科研的发展和提高学术水平。这是对所有大学出版社的普遍要求，是带共性的东西，具体到某一家出版社，则必须依托学校，发挥优势，反映出学校的特色，这样才能办出特色。有远见的大学领导人，总是从指导思想把教学、科研、出版联系在一起，给予出版事业以极大的关心和重视，要求本校出版社积极反映本校的教学、科研成果，这是非常正确的。

武汉大学是一所综合性大学，学科门类齐全，师资力量雄厚，不少学科具有自己的特色或居国内先进水平。为了反映这一特色，我们在构建出书的总体布局、调整选题结构时，从以下几个方面作出努力：

1. 抓住学科优势，突出出书重点。武大的文科，特别是法学、历史学、经济学、图书情报学等学科，在国内同类学科中具有优势。从这一实际出发，我们组织出版了国际私法、国际经济法系列书和图书情报系列书。韩德培教授主编的《国际私法》被评为国家级优秀教材，姚梅镇教授主编的《国际投资法》、梁西教授主编的《现代国际组织》、法学教材编辑部编的《国际关系史》被评为国家教委、司法部的优秀教材。加上《国际经济法概论》、《国际私法（冲突篇）》以及与之配套的《国际投资法教学资料选编》、《国际投资法成案选》、《国际经济法教学资料选编》、《国际经济法成案选》、《国际私法教学资料选编》等，已成为我国第一套国际私法、国际经济法系列教材，被许多高等学校广泛采用为本科生和研究生的教材。陈光祚教授主编的《科技文献检索》被评为国家教委优秀教材。与之配套的《情报语言学基础》、《情报学》、《中国历史文献学》以及《目录学》、《分类学》、《图书馆学导论》、《图书营销学》、《图书发行学概论》、《图书馆文献编目》、《藏目建设与读者工作》等，已成为我国第一套图书、情报学系列教材，为大多数高校的图书馆学专业、科技情报专业和电大、自学考试的学生所采用。

在学术著作的出版上也取得了明显成绩。历史系教授唐长孺主编的《敦煌吐鲁蕃文书初探》、《敦煌吐鲁蕃文书初探》（二编），是两部学术价值很高的专著，它的出版引起国际敦煌学界的强烈反响，使一些持有“敦煌在中国，研究中心在日本”的外国学者不得不承认敦煌研究中心也在中国。吴于廑教授主编的《十五、十六世纪东西方历史初学集》及其《续编》，用整体的眼光，从宏观的角度看待和研究发展中的世界历史，为编写出具有我国特色的世界史迈出了可喜的一步，从而为国内史学界所注目。经济学院的刘涤源、谭崇台教授主编的《当代西方经济学说》，也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重视和好评。

2. 建立出版基金，出版《武汉大学学术丛书》。1988年前后，为缓解学术著作出版难的矛

盾，我社经过多次研究，向学校正式提出了建立武汉大学出版基金的建议，很快得到了学校的支持和批准。成立了《武汉大学学术丛书》编审委员会和出版基金管理委员会。计划每年出版能反映校内第一流学术水平的专著和优秀教材10种左右，五年出书50种左右。这套丛书从确定选题到正式出版，都严格把关，坚持高质量，高水平。目前已经出版陶德麟教授著《中国当代哲学问题探索》、肖萑父教授主编《中国辩证法史》、何华辉教授著《比较宪法》、何国瑞教授主编《文坛是非辩》、唐富龄副教授著《文言小说高峰的回归》、黄锡全副教授著《汉简注释》、胡迪鹤教授著《随机过程概论》等。

3. 与教务处密切配合，抓好自编教材建设。校内本科生、研究生自编教材的出版工作是教材建设的重要方面。自1989年开始，我社与学校教务处经过多次商谈，决定将每年用于内部铅印的部分主干课、基础课教材经费，改由教务处用于补贴公开出版，出版社无偿为其服务。1990年教务处两次推荐这种自编教材23种，1991年20余种；与此同时，各院系还申报一批自编教材，我们在认真审稿、严格把关、确保质量的前提下，选择出一部分确有价值 and 急需的教材，让其自筹资金出版，出版社尽量提供方便和优惠条件。这样每年出版自编教材40余种，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教学的需要。

4. 立足本校，面向全国，积极承担社会任务。武大出版社承担了近300种国家级的教材出版任务。其中国家教委选编教材70余种，国家教委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教材及大纲近200种，国家教委图工委教材12种，中央广播电视大学教材12种，其他部委教材15种。特别是全国自考办这套教材，种类多，数量大，稿源分散，作者遍及全国，工作难度相当大。为此，专门设立了“自考教材”编辑室。到目前为止，已经出版教材和大纲98种，为全国绝大多数省市所采用。除上述教材外，我们还有选择地接受了一批兄弟院校的教材、学术著作出版任务。

从总的方面看，目前我社已经初步形成重点比较突出，以教材、专著为主，结构渐趋合理的格局，出书特色逐步显现出来。

### 三、抓住转机，为出版事业的繁荣多出好书

我社在出版教材和学术著作上取得一定成绩，但随着形势的发展，又深感不足。

目前整个出版业的形势是：困难与转机并存，挑战与机遇同在。在图书市场这个出版业最敏感的晴雨表上可以看出：不仅图书销售码洋逐步回升，市场的购书热也开始转移，读者择书趋向开始发生可喜的变化。在经历过所谓的“武侠热”、“言情热”、“人体热”、“性爱热”以后，开始出现了“毛泽东热”、“雷锋热”。一些层次较高的政治理论读物和学术著作、大中专教材也出现了旺销趋势。这种转机的出现对大学出版社来说无疑是令人振奋的好消息。不仅如此，随着我国政治、经济形势的逐步好转，有了一个稳定的社会环境，有利于我们静下心来认真考虑出版优秀图书的长远规划和近期安排；在全党重视精神文明建设的大好形势下，健康向上的读书风气正在形成，它势必大大增加人民群众对精神食粮的需求；经过扫黄和整顿，遏制了庸俗低下读物对图书市场的干扰和冲击，不仅巩固了优秀健康出版物的发行阵地，而且迫切需要输送大量优秀图书去占领因扫黄留下的市场，以满足人民群众的需要。目前，中央在“一手抓整顿、一手抓繁荣”方针的指导下，正在酝酿制订某些出版发行的经济政策和法规，这对出版业的繁荣发展将产生推动作用。从出版社的自身情况看，我社经过建社十年来的实践，不断地总结提高，创造主客观条件，已经开始从困境中摆脱出来，有了一定的经验积累和经济实力。大家一致认为，争创一流出版社，最终要体现在多出第一流的优秀图书上。

#### 1. 反复论证，确定出书的重点工程

为了组织“重点工程”的出版，从1990年初开始，我社就多次召开专家论证会、学校有关

领导和机关部处室负责人座谈会，广泛听取意见，还到一些老教授家登门求教。经过反复论证，拟组织出版《中国法学百科全书》、《中国传统文化丛书》以及《荆楚文化大辞典》等书。前者不难确定，因为我校法学院在全国占有重要地位，有一批国内外知名的专家、教授。经过一段时间的论证和酝酿，以韩德培教授领衔，马克昌院长出面组织，以武大法学院为主并邀请国内部分法学专家参加的10卷本2000万字的《中国法学百科全书》的编写、出版方案便初步确定下来。至于出版《传统文化丛书》就不那么简单了。当时尽管学习了李瑞环同志关于弘扬传统文化的重要讲话，觉得我们选择的方向是正确的，但传统文化方面的书最近出得较多，要选择新的角度，写出新的水平比较困难。以“传统文化”为题出丛书，范围太宽，缺乏特点，开了几次论证会也确定不下来。最后大家的意见慢慢趋于一致：从我校历史系唐长孺教授主持的魏晋南北朝、隋唐史的研究出发，出一套《魏晋南北朝、隋唐文化研究丛书》。这一选题的确定得到了原国家教委教材办领导同志的肯定，目前正在抓方案的实施和书稿的落实。

这两项重点工程已经列入“八五”选题规划。在统一思想的基础上，确定“八五”期间21项大型和中型项目，226卷次，总计8230万字，年平均1646万字。这当中不少项目是经过反复论证才定下的。比如《学者谈“整体化”丛书》、《荆楚文化大辞典》、《大众理论丛书》、《当代重大理论问题研究》、《国共两党关系通史》等的确定，都经过了反复的酝酿和论证。

## 2. 抓住新思想、新内容、新视角方面的选题

我们正处在巨大变革的时代，紧紧跟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的步伐，跟踪世界范围技术的发展，提出新的选题，介绍新的观点、知识和方法，既是出版部门不可推卸的职责，也是优化选题的重要领域。事实证明，许多以“新”取胜的出版物总是深受读者欢迎的。

对于“新”的理解要实事求是，有些书在新领域开拓方面具有独到或填补空白的作用，这是一种高层次的新；有些书虽带“启蒙”性质，但适应了我国人民由长期封闭状态走向开放、面向世界的心理，对某些从未接触过的读者来说自然也是新的；有些书则是以选题的角度新为其特色的。常有这样的情况：某一类型的书出了不少，内容基本大同小异，可是突然出现一本书，虽然研究的对象没有变，由于作者精心选择了一个全新的角度，重新谋篇布局，使某些性质相近的材料生辉放彩，成为很受读者喜爱的佳作。这说明，写一本书所选取的角度，或者叫选择思维的切入点，是非常重要的。所谓“正确的选题是成功的一半”。每个作者在动笔之前都要长期酝酿自己的选题角度，至于是否能选得巧妙，则取决于自身的素质和水平。

## 3. 提高质量，把好的选题变成优质的书

建社十年来，武大出版社的出书质量不断提高，在1985—1988年出版的图书中，荣获国家、部委和省级以上奖励的61种，获奖图书总数在湖北地区13家出版社中名列前茅。尽管如此，从总体工作来衡量，提高图书质量仍然是我社面临的一项严重任务。为此，1991年伊始，社里多次研究，要在全国“质量、品种、效益”年的大气候下，集中力量把质量抓上去。目前已经初步制订出《质量评估实施办法》，正在组织实施。通过抽样检查，质量评估，增强质量意识，把整个的编辑出版工作大大提高一步，使好的选题变成优质的书。

## 四、加强管理，掌握选题工作的主动权

优化选题在出版社的各项工作中占有重要地位。毫无疑问，一个出版社要想办好，必须认真抓好这项工作。事实上绝大多数出版社都是这样做的。但是要真正抓好这项工作并非易事。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我们体会到，优化选题必须抓好四个方面：

首先是确定正确的选择标准，建立合理的选题结构。大学出版社要按照国家新闻出版部门所规定的出书范围去确定优化选题的方向，主要任务是出版教材、教学参考书和学术著作，

应该在这个范围内来调整和建立合理的选题结构；反过来说，不属于出书范围，就是赚钱再多的选题也要坚决舍弃。几年来，我社一直在朝着这个方向努力，但由于主客观条件的限制，未能尽如人意。由于经验的积累和条件的逐步成熟，这次制订“八五”规划和1991年选题计划就比较严格，教材、学术著作占到了整个选题计划的80%以上，校内的占到了60%以上，不属于出书范围的选题基本上没有。突出了重点，调整了结构。

其次是要与学校有关部门协调行动，共同解决知识分子出书难的问题。毫无疑问，要出大批的学术著作和教材，在当前出版业仍然不算景气的情况下，光靠出版社的力量是不够的。前几年，我社曾经出现过三个“不得不”：①由于原材料、印刷和发行费用大幅度涨价，最大的难题是出书亏损，某些学术著作和发行面窄的教材不得不搁浅；②由于经济实力严重不足，出版社又是自负盈亏单位，为了“以书养书”、“以盈补亏”，同时解决全社职工的生计问题，不得不适当砍掉一些层次较高但经济效益差的选题，增加一些经济效益有保障但内容一般的选题；③由于某些单纯以赢利为目的的出版、发行单位的作用，致使国家新闻出版部门屡屡限制的某些图书仍然充斥市场，我们纵有多出好书的愿望，但也不得不从发行工作的实际效果考虑，违心地出了一些水平不高的读物。今年的情况将大有好转。我们的经济实力有所增强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出版工作得到了学校的全面支持，不仅落实出版基金，保证学术丛书的定期出版，对一部分优秀自编教材的出版进行亏损补贴，科研业务部门也千方百计资助出版，实在安排不了的向校外出版社推荐；还有各院系对本院系教师出书进行的部分补贴。这样，几方面的力量汇聚在一起，积少成多，就使一批优秀教材、学术著作能得以问世，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知识分子出书难的矛盾。

第三，要有一个强有力的领导班子。我社的选题工作是社长、总编辑亲自抓。其选题决策程序是：由对口编辑室接谈或组稿，根据出书范围和书稿质量进行第一次选择；再报总编辑室归总，进行论证，作第二次选择；然后报社长办公会讨论，作第三次选择，最后定案。社长、总编辑带头遵守这一程序，不随便个人说了算。如果有时因为特殊情况不得不考虑变动时，也要与主要负责选题的同志通通气，然后在下一次会上说明情况，通报认可。由于在优化选题中大家的目标一致，又有了明确统一的选择标准，共同遵守有关的规章制度，逐步形成了一种紧密配合、平等协商的气氛，因而使选题的论证和决策工作进展比较顺利。

第四，要有一支思想活跃、素质较高的编辑队伍。广大编辑站在选题工作的第一线，无论是组稿，还是接谈选题，编辑都直接与书稿打交道，与作者打交道，编辑实际上承担着选择书稿和选择作者的双重任务。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编辑的眼光和水平决定着选题优化的程度。一个好的编辑，一要能坚持党的四项基本原则，熟悉并执行党的出版方针、政策和出版法规；二要懂得本学科学术研究的历史和现状，逐步成为研究本学科的学者和专家，还应兴趣广泛，博览群书，成为杂家；三要信息来源广泛，只有头脑里贮存的信息量大，才能对信息群作出正确的选择。还应熟悉图书市场，密切注视读者心理的转换。我社目前已经逐步形成了一支老、中、青结合的编辑队伍，他们在组稿过程中自觉锻炼自己，在优化选题上发挥了重要作用。